跟坏小子合作

刘 齐

早晨，我破例上街吃早点。

我们这一带，住了十几万人。可能是为了促进黎明时的勤奋，锻炼人们在家做早点的能力，中午之前，街区各饭店大多不开门。只有一个小饭铺，卖地沟油制作的不洁早点，服务生的指甲有黑边。

昨晚散步，发现一家正规饭店，也开始经营早点，高兴，认为是新生事物，或者好传统的光复，今天一早，特地前来支持。

前来支持的人很多，不得不排队。现在除了银行和交易所，哪里还排队？由此可见，广大市民对公共早点的渴望，不亚于股票。政府提倡和谐，至少这个不和谐。舆论呼吁过，不好使。政府应该跟饭店说，不要只想着午餐晚餐赚钱，早餐也得有，谁开早餐，给谁优惠，不开的，加税。

形而上下

我发现自己考虑问题，有点像干部，得意，边想边随队列移动。排头只有三名顾客了，油条和豆腐脑品相诱人，气息正宗。

侧翼，某人靠拢过来，有加塞儿倾向。我警惕，跟紧队伍。

那人跨前一步，向窗口递钱。

无人制止，即使正在被他直接妨害的排头顾客，也心平气和，假装看不见。这很奇怪，因为该人虽年轻，长相却不恶，个头也不高，“敌”我力量对比，有利于守秩序的一方。

“排队！”我忍不住高喊，“后边去！”昨晚我睡得好，醒来振奋，对现实充满希望和责任感。

我不是豪杰，不会武，但我个子高，穿长袖衫，外人看不出胳膊粗细，刺青与否。而且，没洗脸，头发蓬乱，用语蛮横，不说“先生”，“请”，不像知识分子，像社会大汉，这就给加塞儿那小子，施加了某种威力。

那小子缩手，停止递钱，却不去排尾，而是站着不动，跟我，处于所谓相持阶段。他一定看到，我是戴眼镜的人，并非一条地道的壮汉。这是一个遗憾。

若是排得快，放他一马也无妨，偏偏很慢，顾客顾家，一人往往买七八根油条，现炸，费时间。

排头还有两人，坏小子仍站在窗口，窥伺时机。说他是坏小子，不冤。他在别的时间、空间也许是好人，但现在这几分钟，太差，不及格。

“排队去！这么多人，哪能不排队？”我继续催，扭头，对着大家，“是不是啊？”我的本意，是想发动群众，求得声援。这个并不复杂，语法上叫：一般疑问句，只须回答“是”或“不是”，就管用。与此相比，特殊疑问句难一些。如果我说，加塞儿是个什么行为呀？咱们大家，应该怎样对待呀？就是特殊疑问，群众一定困惑：这孙子谁呀？这么说话？回答也就千奇百怪，不了了之。

我微笑，等待大家说“是”。无须多，有二三个“是”，就有二三颗友军的子弹，叭！叭叭！足矣。不料，大家惜字如金，等了半天，硬是无人答话，连哼一声都不肯。群众，不是你想发动，就发动得了的。坏小子受了鼓舞，上身前倾，蠢蠢欲动。

“哎我说，排队啊，早晚能排到。”我听见自己孤零零的声音，语气已趋和缓，不像是仗义执言，倒像是苦苦相劝。我心不甘，再次问大家，“是不是啊？”仍然无人回答，只有油条在油锅里咝咝响。

人们目光冷漠，或者游移，躲闪，不悦，似乎嫌我多事，竟然将如此讨厌的选择，强加在大家头上。本来，早晨挺美好的，豆腐脑挺嫩的，你偏要让我们公开个人看法，凭什么？

我不再看群众，哪里有群众？我只看坏小子，确切说，看坏小子的腰。

腰平常，没带刀。带刀也不怕，我比坏小子高，我能用板凳抵挡，我有劲，一拽，就把坏小子……拽过来。

“干什么？”坏小子有点紧张。外强中干。麻秆儿打狼，两头害怕。“你不是想加塞儿吗？”我说，“加吧，就加我后头，我买完了，你买。”

坏小子松口气，想笑，没笑好，更像坏小子。

众人还是无言，静静面对，我和坏小子结盟。

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贪婪

王 寅

即使很多年以后，我都不会忘记2003年深秋在东京御茶水客栈的那个夜晚。已经过了午夜时分，我的同事杨子、风端还在MSN上和我热烈地讨论第二天采访佐藤忠男的提问设计。对佐藤忠男的采访是东京之行重要的环节，要了解小津安二郎的生平创作绕不开这位日本最著名的电影评论家。杨子和风端在网上不断地支招，我把他们设计的采访提问整理之后，抄录在笔记本上。为了加快速度，风端干脆直接将电话打进房间面授机宜，直到把一张IP卡打完，此时已经是凌晨三点。

第二天上午的采访异乎寻常地顺利，预定的两个小时采访，提问与回答来来往往一刻不停。采访结束的那一刻，我如释重负：毫无疑问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采访。应邀担任翻译的刘亦华老师却面色苍白，几乎无力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在密不透风的问与答中，她是最吃重的。后来在东京的朋友告诉我，佐藤对那次采访赞赏有加，令日本朋友吃惊不小，因为在他们眼中，佐藤一贯以严厉苛刻著称。

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2002年的无锡金鸡百花奖上。在采访香港导演许鞍华和尔冬升之前有限的准备时间里，远在北京和广州的同事夏辰、杨子、风端用最快的速度提供背景资料，设计采访提问。当我出发去采访的时候，已经底气十足。还有什么比身处这样温暖的集体之中更幸运的呢？

序跋精粹

收在本书中的文字都是为我所服务的报纸所作的访问。由于篇幅的缘故，见报的只是一小部分。重新再读这些篇章，采访时的情景历历在目。

每一次采访都是一次不可预知的遭遇，都是一次奇异的旅行，会进入无法预料的地带，比如蒋勋谈到年轻时狂热地追随大陆文化，比如朱天文谈到她回到故乡的感受，比如贺友直谈到“文革”往事时泪流满面……也唯有如此充满变化的采访才会令人充满期待。每每在采访完毕，我走到街上，兴奋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，不亚于看了一场好电影。

采访的乐趣使得采访的时间越来越长，从一两个小时到半天，到连续数日。第二次采访蒋勋的时候，我曾经要求了一整天的采访时间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贪婪，希望被采访者倾其所有。在对艺术创作本身的关注之外，我同样关心的是艺术家们的人生观、生活方式和人生故事，因为我自己也有太多的困惑和迷惘，希望获得求证和解答。我会向不同的采访对象问同样的问题，即使得不到答案，他们的人生经历也是很好的参照。

本书的书名《艺术不是惟一的方式》来自许鞍华导演在采访中的一句话“电影不是惟一的方式”，取其引申和扩展之意作为本书的书名，这也是我做这些采访的出发点——艺术不是惟一的方式，艺术是生命状态的反射和映照。为此要感谢这些非凡的艺术家和他们充满睿智的思想。

《艺术不是惟一的方式》序

参星和商星

赵丽宏

玉屑集

参与商，是天空中的两颗星星。抬头仰望星空，却无法找到参星和商星。但我知道，这两颗星，相距遥远，永无相逢的机会。杜甫诗云：“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”，活着而无法相会，那就如同空中的参星和商星。

杜甫的这两句诗，是《赠卫八处士》的开首两句，这首诗，是唐诗中流传很广的作品，在杜诗中也是很特别的一首。诗中，杜甫记叙了与一位分别二十年的老友相见，生出无穷感慨。青少年时代的知交，久别重逢，会出现怎样的景象？且读杜甫的《赠卫八处士》：

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。今夕复何夕，共此灯烛光！少壮能几时？鬓发各已苍。访旧半为鬼，惊呼热中肠。焉知二十载，重上君子堂。昔别君未婚，儿女忽成行。怡然敬父执，问我来何方。问答乃未已，儿女罗酒浆。夜雨翦春韭，新炊间黄粱。主称会面难，一举累十觞；十觞亦不醉，感子故意长。明日隔山岳，世事两茫茫。

卫八处士，史书中没有记载，不是官吏，也不是名人，是一个乡间隐士，不过毫无疑问，他是杜甫青年时代的好友。杜甫和卫八处士交往是在青春年少时，二十年后重逢，两人都已鬓发斑白，问起当年的朋友，很多已经离开人间。唏嘘间，看到未曾见过的下一代，分别时，友人还没有成婚，此时竟已儿女满堂。这是人生的收获，也是岁月的见证。儿女们是那么有礼貌，对父亲的朋友尊敬而友好。老友的招待很简单，清茶淡酒，韭菜黄粱，却胜似山珍海味，散发着友谊的温馨。在烛光下，老朋友举杯痛饮，一杯接一杯，酒逢知己，说不完的心里话。在诗中，杜甫把老友相见的场景以及自己的心情写得生动而感人。当时正是战乱年代，和老友相逢生出劫后余生的感慨，人生聚散无常，别易会难。读这样的诗，能感受到诗人内心的沉郁和苍凉。这首诗语言平淡朴素，虽是简洁白描，却能打动人心，原因无他，只因诗人的真挚。其中对人生的感伤，对岁月的感叹，对友谊的赞美，今天读来仍使人产生共鸣。

古诗中，我偏爱五言诗。五言诗文字简洁，音韵铿锵，直抒胸臆，这也是《古诗十九首》千百年来魅力不衰的原因。杜甫的《赠卫八处士》和《古诗十九首》同出一辙，有汉魏气韵，也使人联想到陶渊明的创作。但杜甫诗中表现的是他的当下生活，情感内涵比汉魏古诗更丰富，也更复杂。杜甫的诗句似乎是随心所欲，信手写来，然而却跌宕有致，始终有一种扣人心弦的情感魅力，使人情不自禁随之叹息。全诗以“人生不相见”开篇，以“世事两茫茫”收场，苍凉之感溢于纸上，而诗中弥漫的温馨，则在苍凉之中萦徊不尽。明末王嗣奭《杜臆》评价这首诗“信手写去，意尽而止，空灵婉畅，曲尽其妙”。清代浦起龙的《读杜心解》，认为此诗“古趣盎然，少陵别调。一路皆叙事，情真，景真，莫乙其处”。清代张上若说它“情景逼真，兼极顿挫之妙”。这些评价，我以为都切中要点，尤以两位清人的评价更为准确，如果不是真情流露，这样的诗不会如此动人。诗歌的形式和内容结合得如此完美，杜甫的《赠卫八处士》堪称典范。

解文金的油画

芥子园

画家解文金是标准的学院派，作为著名画家徐芒耀的研究生，他的绘画理念完全是传统的，那就是注重创作的思想性与技法的精深度。这次他入选青年美展的两幅作品，画的是坐在普通椅子上的披着围巾的妇女，样貌平平，略带异国情调，粗看似乎并不起眼，但内行人知道，画家通过那静态的眼神与形体刻画，表现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。

解文金与当下那些已经走向市场的职业画家生存状态不同，他能静下心来以研究的心态来从事油画的创作的探求，更多地继承了具有启蒙思想的艺术观念，他不画“时尚美眉”，也不喜欢故弄玄虚地搞一些色彩和形式上的“新花样”，他的画看似沉重，但从细节到内涵都很耐读，经得起细细的品味。在这里我不是说时尚的流行的不好，那些在市场上的弄潮儿，他们关注的是形式的生动活泼，而现代都市本身的开放也适合这类画家与他们的风格的张扬。不过油画是伴随着丰满的精神与科学的技术美的经典艺术，它更长于以全面的艺术素养展现人的精神，不是简单地靠聪明来“秀一把”就能达到一定高度的。

解文金来自安徽滁洲，自从有了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，那里名闻遐迩，传统的诗礼之邦也给了他特别的人文积淀，而扎实的学院经历更为他成就艺术梦想作了最佳的铺垫。解文金是幸运的，从和他的交谈中，我感受到了那如他笔下人物般的透亮的眼神，也感受到了他对油画艺术那一份执着的追求。

红披肩女子（油画） 解文金

在上海街头叫卖香烟

徐连宗 陈劲松

采访陈兆金，这位担任过武警部队内卫处处长的老兵，除了他的外形干练和精神矍铄外，给人的印象就是香烟抽得凶，不到两个小时，抽掉了大半包香烟。说起抽香烟，还跟他当年的革命生涯有关。

1949年5月12日，解放上海的枪声打响，陈兆金随部队进了上海。此时的国民党军早没有了往日的嚣张气焰，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般打过了苏州河。

刚刚解放的上海，国民党残留下来的特务很多，暗杀共产党人的事件时有发生。为了确保首长的绝对安全，陈兆金经常装扮成卖香烟的生意人，胸前挂一个木箱，里面放着当时很有名气的香烟，像骆驼牌、美女牌等，在街头叫卖。根据规定，他们卖香烟时，遇有特殊情况可以抽上几支，以便更好地让人感觉他们真是卖香烟的。也就从那时，他学会了抽香烟。有时首长需要外出时，他便装扮成踩三轮车或脚踏车的车夫，紧跟首长左右，对首长途经路线进行侦察，确保首长安全。

1949年10月1日，当全国人民都为新中国成立而载歌载舞时，陈兆金和警卫团其他同志的任务却变得繁杂而严峻，因为在1日当天晚上，陈毅和其他首长要在跑马厅露天广场参加群众集会，和上海群众共庆新中国成立。在这样的公共场合进行警卫，这对陈兆金及警卫团其他官兵来讲都是一次考验和挑战，而且容不得半点闪失。那一夜，陈兆金的心都是提在嗓子眼里的，密切注视着周围每个人的细小动作和眼神，直至任务圆满完成。

陈兆金的机智勇敢算是有点天赋的。1944年，12岁的陈兆金当上了儿童团团长。当时，盘踞在山东东平县柿子园和梯门山的两个日伪军据点像两颗毒牙，对群众生活和地下党工作构成巨大威胁。为铲除据点，村地下党决定派衣衫褴褛的陈兆金当侦察员。

受领任务后，陈兆金伪装成放羊娃，在敌据点附近赶着几只羊，时刻观察着据点里敌人的动静，并把每天敌人换岗的次数、人数等情况向村地下党员报告。一个下午，柿子园据点头目刘玉荣离开据点，偷偷地赶往他的姘头家。他的这一行动，没能逃脱陈兆金的视线，一路跟踪，在准确打探到刘玉荣的落脚点后，陈兆金立即向村地下党组织进行了汇报，刘玉荣在其姘头家被当场击毙，随之柿子园据点被铲除。

1947年10月，陈兆金带着自己的革命理想，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，从泰安来到青州，正式参加了革命，成为三野司令部警卫营的一名战士，并先后参加了解放济南和淮海战役。

1954年8月，从华东公安警卫团便衣大队三个中队挑选的六七十人集体转业，安排到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，陈兆金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，正式成为一名警卫干部。他们那时候除了警卫任务，还有一项特别的事情，就是养猪种菜，搞农副业生产。正常情况下八小时担任警卫执勤，八小时外专门搞生产劳动。大家情绪很高，有的同志背上晒得脱皮，仍然坚持劳动，为毛主席等中央首长能够吃到战士们种的蔬菜感到非常光荣。到现在他还记得，那时毛主席还特地向外宾介绍说，这是我们警卫战士们种的菜，又好看，又好吃。

警卫工作光荣而神圣，但使命与责任同在，特别是担负首长警卫工作更容不得半点私人感情。1958年，毛主席来上海视察工作后，观看文艺汇演。陈兆金担负礼堂大门警卫任务。演出开始不久，一位曾非常关心他的老政委想进礼堂看演出，但被他坚决地挡在了门外。现在说起这事，他还觉得对不起老政委，“但那是纪律，谁也不能违反。”陈兆金说。

十日谈

烽火记忆

明日请看《还乡团悬赏50块大洋抓他》。